

臺灣平面媒體呈現的「牙刷主義」爭議（1976-1980）*

劉立德**

隨著1970年代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面臨一連串的挫敗，使人們對臺灣前途產生不確定感，因此許多有能力的人便透過各種途徑移民美國。

許多黨政軍高層人士透過管道取得綠卡這個公開的秘密為當時輿論所詬病。這些特權人士的行徑不僅被外界譏諷為「牙刷主義」者之外，更引發當時輿論的強烈撻伐。「牙刷主義」同時也挑動當時鄉土意識高漲的臺灣社會的認同危機，國民黨政府在面對「牙刷主義」的曖昧態度亦為黨外人士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口實。當年「牙刷主義」所引發的認同危機更是持續至今。

本文旨在探討在當時戒嚴體制下新聞自由受限的臺灣平面媒體如何報導這個問題，這些報導如何呈現出當時臺灣社會的集體心態與社會氛圍，以及臺灣意識認同與中華民國認同這兩種不同的認同意識在「牙刷主義」爭議展現的分歧。

關鍵詞：綠卡、牙刷主義、國民黨、平面媒體、臺灣意識

* 本文撰寫過程中，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

一、前言

隨著 1970 年代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的一連串挫敗，使臺灣民眾對臺灣前途產生不確定感而促進移民美國的潮流，而這個現象在 1978 年中美斷交時達到頂點。對於這股移民美國的現象（也就是俗稱的「牙刷主義」），當時臺灣各界都予以強烈責難。本文試圖從當時不同立場的臺灣平面媒體對於「牙刷主義」的報導、態度進行分析，探究當時不同立場的平面媒體如何看待此一現象，以及當時輿論所呈現的社會氛圍。

在探討臺灣 1970 年代後半的「牙刷主義」問題爭議時，先對「牙刷主義」一詞進行簡介，此一名詞始自於臺灣社會於 1970 年代後半期用所謂「牙刷主義」來形容試圖移民美國的臺灣人士，意指在國外已萬事皆備，必要時只帶一支牙刷就可遠走高飛，惟此一名詞的原始出處已不可考。¹當時若干媒體用「綠卡問題」來指涉「牙刷主義」，為求行文統一起見，本文內文均以「牙刷主義」稱之。

再者，關於美國於 1978 年 12 月 16 日宣布與中華民國中止外交關係的歷史事件，近年來學界多以「臺美斷交」來取代過往國民黨史觀的「中美斷交」，為配合近年來學界的趨勢。因此，本文內文以「臺美斷交」來取代「中美斷交」一詞。

本文所選定的時間範圍從 1976 年國家圖書館館長諸家駿雙重國籍事件到臺美斷交後的 1980 年為主。

本文所選定的臺灣平面媒體分為：（一）黨營報紙，以《中央日報》為主；（二）親國民黨政府報紙、雜誌，以《中國時報》、《聯

¹ 參閱王璇，〈蒲公英族〉，《聯合報》（新北），1984 年 5 月 24 日，8 版。

合報》、《新聞天地》為主；（三）非國民黨報紙，以《自立晚報》為主；（四）黨外雜誌，如《夏潮》、《富堡之聲》、《美麗島》。

本文希望透過這些不同立場的平面媒體對「牙刷主義」的報導、評論來分析當時臺灣平面媒體對於「牙刷主義」的態度和背後的政治意涵與當時的社會氛圍。

二、背景

臺灣 1970 年代的「牙刷主義」的背景可以從外在和內在因素來看。從外在因素來說，自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於 1972 年訪問中國所引發的外交危機使中華民國外交局勢出現危機，而 1978 年 12 月臺美斷交更嚴重打擊中華民國的統治合法性；另外 1975 年 4 月中南半島赤化使臺灣大眾對臺灣前途更感到悲觀。從內在因素來看，蔣中正總統於 1975 年逝世，儘管去世前由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接班的局面已然浮現，但是仍然有許多人不好看臺灣局勢。

不容諱言，自 1949 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後，仍然有許多人對於臺灣局勢抱持疑慮而尋求更安全、更有發展機會的居住地，而當時國民黨政府最主要的支持者——美國自然成為這些人尋求移民的對象。特別是在 1970 年代隨著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之後，引發一連串邦交國斷交的骨牌效應，使臺灣社會產生強烈的危機感，於是不少有力人士就透過各種管道移民美國，促進這股移民美國的風潮。

弔詭的是由於美國法律規定綠卡者須每年居留於美國一個月，但是臺灣對於申請出國的審核頗為嚴格，除了留學生、農技團成員和若干循正常管道移民的民眾之外，惟有黨政軍高層人士可以用公務名義出國。對於許多黨政軍高層人士透過管道取得綠

卡這個公開的秘密為當時輿論所詬病：

「為保持綠卡有效，每年須到國外居住一段時期。低級人員當然無此能耐，惟有高級人員得以公務名義出國，假公濟私，所關者小，汙損國格，動搖人心，殊覺茲事體大。」²

這些人士之所以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在於這些人雖然取得美國國籍，但是仍然在臺灣擔任公職或賺錢，更甚者甚至在臺從事金融投機、吸金活動，等待時機捲款潛逃；這些行徑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塑造的愛國主義氛圍影響的臺灣社會中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這些特權人士的行徑不僅被外界譏為「牙刷主義者」之外，亦為黨外人士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口實。因此國民黨政府在處理此一議題時不免有投鼠忌器之感。因此本文中當時臺灣平面媒體對於「牙刷主義」的探討均集中於特權人士移民美國所造成的社會問題。

三、爭議的開端：諸家駿事件

國民黨政府自南京時期以來即相當重視公眾輿論，透過各種方式企圖影響媒體，尤其是 1949 年國共內戰失利遷臺後，對媒體的控制越發嚴厲。³正如媒體工作者呂東熹所指出的：

「戒嚴時期的媒體控制，除報館負責人或採訪負責人內心的『自我檢查』，以及情治單位事前事後對新聞內容的『實

² 〈黑白集：卡之綠兮〉，《聯合報》（新北），1978 年 6 月 18 日，3 版。

³ 關於國民黨戒嚴時期對媒體控制的相關研究，可參閱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戰後台灣媒體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獎基金會，2008）。

質檢查』外，尚有包括監控、約談與干預或滲透等無孔不入、行徑囂張的控制手段。」⁴

儘管到了1970年代，國民黨政府對於臺灣媒體控制的力道已不若1950、60年代，但是對於輿論的箝制仍然相當嚴厲。

當時的臺灣主流報業，除了黨營的《中央日報》之外，當時臺灣兩大媒體《中國時報》與《聯合報》更是和國民黨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僅有《自立晚報》被視為自由派的主流平面媒體。但是隨著1970年代黨外力量的逐漸興起，黨外媒體如《美麗島》、《夏潮》等相繼創刊，形成國民黨控制的主流媒體輿論以外的另一種不一樣的聲音。

進入1970年代以後，國際局勢的劇變造成中華民國外交處境的惡化，使移民美國風潮所衍生的「牙刷主義」問題。不僅是持有綠卡者或家族已移民美國的人士成為臺灣社會放大檢視的對象，特別是這些移民美國的人士當中的國民黨政府的政商菁英人士越來越成為臺灣輿論關注的焦點。

「牙刷主義」問題之所以浮上檯面被臺灣主流媒體所報導，始於1976年2月下旬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諸家駿被人向監察院檢舉其在旅美期間已歸化美國國籍，具有美國國籍，違反國籍法施行條例第十條「中國人已取得外國國籍仍任中華民國公職者，由該管長官查明撤銷其公職」。⁵此一事件引發當時臺灣輿論的熱烈討論。

對於公務員具有雙重國籍的爭議，政府的態度可以從《中央日報》、《中國時報》一窺端倪，《中央日報》除了對諸家駿「雙重

⁴ 呂東熹，《政媒角力下的臺灣報業》（臺北：玉山，2010），頁137。

⁵ 〈黑白集：公職與國籍〉，《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19日，3版。

國籍」事件的新聞作簡短報導之外並多未報導，而《中國時報》除了報導相關新聞之外，也報導出國民黨政府的聲明，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於公務員「雙重國籍」的態度是相當曖昧的，例如教育部長蔣彥士在 3 月 13 日回答立委質詢時表示：

「我們要爭取許多心向祖國的僑民，必須承認他們雙重國籍的身分。所以，為了國家利益，所以，目前不宜談這個問題（按：雙重國籍問題）。……他（蔣彥士）還說，對於雙重國籍，要看是什麼國家，友好國家的國籍，我們當然承認。」⁶

此外，《中國時報》也採訪同樣具有美國國籍的國科會主任委員徐賢修，徐賢修認為追究雙重國籍問題徒然是劃地自限的作法，並且他指出「雙重國籍無損愛國，不應計較。」他也藉著《中國時報》採訪的機會批評國內對雙重國籍者的批評聲浪只是「門戶之見」的狹隘心態作祟，說穿了只是國內學術界「深恐飯碗被搶走的歇斯底里」所煽動起來的。⁷

儘管政府官員如蔣彥士與徐賢修在諸家駿的國籍爭議中試圖以「國家利益」或「惟才是舉」的理由為這些具有美國國籍的公務員辯解，但是未能使輿論信服，例如當時臺灣省議員李子駿在 1976 年 6 月 4 日在省議會質詢時強烈抨擊如諸家駿這樣的菁英份子不擇手段取得外國籍公民權或居留權，絲毫沒有任何責任感和羞恥感。他指出社會輿論對這類人士的觀感：

⁶ 〈雙重國籍擔任公職按國籍法並無不可〉，《中國時報》（臺北），1976 年 3 月 14 日，2 版。

⁷ 〈四萬科技人才儲備國外劃地自縣科學怎能發芽？〉，《中國時報》（臺北），1976 年 3 月 8 日，3 版。

「目前街談巷議，將此類人物稱之為『牙刷主義』，意即在國外已萬事皆備了，必要時只帶一支牙刷就可遠走高飛。這真是令人痛心。」⁸

即使被視為國民黨官方喉舌的《聯合報》，在社論對於諸家駿雙重國籍事件也持批判性的觀點，認為公務員中具有雙重國籍者應放棄外國國籍，以表示其愛國的決心：

「以目前國家處境。從海外回國擔任公職之高級知識份子，原具有雙重國籍者，如能主動放棄外國國籍，不但可避免『腳踏兩條船』之譏，並可起帶頭示範作用，對促成國人更進一步之團結，建立對國家的更堅強信心，發生深遠的影響。」⁹

對於蔣彥士與徐賢修以「惟才是舉」的論點，《聯合報》也含蓄地表達反對：

「站在國家用人求才的立場，至少應該要求那些國家一時必需的人士，在回國出任首長級公職的兩年之內，放棄外國籍，以示風雨同舟，共赴國難之決心。」¹⁰

更令人玩味的是《聯合報》指出公務員雙重國籍問題並不僅

⁸ 〈謝主席昨籲同胞以做中國人為榮牙刷主義令人痛心省議員指謫移民思想〉，《中國時報》（臺北），1976年6月15日，2版。

⁹ 〈身具雙重國籍能否擔任公職？決心共赴國難，似應知所抉擇！〉，《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19日，3版。

¹⁰ 〈大家談：雙重國籍者的任職問題權衡利弊不可不慎〉，《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21日，2版。

只於極少數個案：

「事實上，這個問題不只是發生在諸館長的身上，而是發生在很多公職人員，包括若干政府有關部門首長身上。」¹¹

從上述平面媒體對於諸家駿的報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國民黨的官方媒體《中央日報》與親官方媒體《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對於公務員雙重國籍問題的態度各不相同。從《中央日報》未對此事件發表評論的淡化處理，《中國時報》為這些雙重國籍者緩頰，《聯合報》則持批判性態度，認為國家處境艱難，擔任公務員的雙重國籍者宜放棄外國國籍。

相較於《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三報，自由派媒體《自立晚報》與黨外雜誌《夏潮》則是疾言厲色的撻伐。

《自立晚報》除了大幅報導諸家駿雙重國籍爭議的新聞之外，對於蔣彥士公然說出「為了國家利益，所以，目前不宜談這個問題」為諸家駿這樣具有雙重國籍的官員緩頰更是不以為然，在社論蔣彥士的說法難以苟同，認為是對於「牙刷主義者無形地給予鼓勵」。¹²

至於《自立晚報》專欄作家寧天仇更批評蔣彥士是在鼓勵「大家將子女往外國送，讓他們成為美國的二等國民，然後再回來成為我們的官員。」¹³

至於《夏潮》，則是於1976年8月出刊的雜誌中猛烈抨擊雙重

¹¹ 〈身具雙重國籍能否擔任公職？決心共赴國難，似應知所抉擇！〉，《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19日，3版。

¹² 〈社論：雙重國籍問題評議〉，《自立晚報》（臺北），1976年3月15日，1版。

¹³ 〈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自立晚報》（臺北），1976年3月16日，8版。

國籍者腳踏兩條船的行徑：

「牙刷主義者不僅是開溜主義者，他們的血管向兩邊插，血卻向外輸流，他們不僅僅打算一走了之就算了，他們的一條腿，還有力地盤踞在這裡，還不放棄吸取同胞血液的機會呢！」¹⁴

在同年12月出刊的《夏潮》的〈論牙刷主義〉一文更嚴厲地抨擊「牙刷主義」如同臺灣的害蟲：

「『牙刷主義』之危害臺灣社會，有如白蟻之蛀巨廈，癆病蟲之腐蝕人體。」¹⁵

並呼籲政府當局徹查在公務體系的「牙刷主義」份子。但是國民黨政府全然毫無動作。

除了前述報章雜誌的報導之外，當時民眾是怎麼看待此一事件的反應？或許可以從這段期間《聯合報》的民意欄的讀者投書中看出端倪，其中一位筆名「高風」的讀者在2月25日以身為美籍華人的角度為持有雙重國籍的公務員抱不平，認為一味排斥雙重國籍者只會造成海外學人卻步不願為國服務，造成國家的損失並疏遠旅美僑胞的向心力，況且「放棄了美國國籍，以後恢復困難，赴美不易。」對於國內的反彈聲浪，他不以為然，認為純粹是臺灣社會「怕搶飯碗的醋意」作祟。¹⁶

¹⁴ 路愈之，〈牙刷主義〉，《夏潮》，1：5（臺北，1976.8），頁42。

¹⁵ 丁白，〈論牙刷主義〉，《夏潮》，1：9（臺北，1976.12），頁23。

¹⁶ 〈大家談：一個華裔美人談雙重國籍問題〉，《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25日，2版。

但是這封讀者投書刊登後，遭到許多讀者投書的意見激烈反駁其論點，這些反對意見的論點主要在於：（一）任憑公務員，尤其是出任要職者持有雙重國籍，此例一開，那麼這個政府長期下來會在心理上以美國為本位，有損中華民國主權獨立。（二）政府只知重視擁有美國公民的「旅美學人」，卻不願重視本地人才，「一個國家要萬世長存，需要的力量，應由自己的內部產生，應由自己的人民掌握國家的命脈。」更有專欄作家批評政府這種作法是「用假洋鬼子來主持文化、教育、科學或行政的大計」是自賤國格的行為。¹⁷

諸家駿館長的雙重國籍問題雖然最終被監察院認為諸家駿係為兼任館長，而非正式館長，故尚無違法。¹⁸諸家駿也隨後於1977年初悄然卸任，轉任律師，這起爭議暫時告一段落。

但是諸家駿事件只是「牙刷主義」問題的冰山一角，正如《聯合報》所報導的公務員雙重國籍問題在政府內部是「發生在很多公職人員，包括若干政府有關部門首長身上」，在三年後《新聞天地》專欄作者胡士丹的後見之明看來，《聯合報》證實這個問題並非是坊間的風言風語，成為引發了臺灣社會各界對「牙刷主義」問題高度關注的導火線。

「國人注意『綠卡』問題，不始自今日。緣由三年前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諸家駿先生，被人向監察院檢舉指稱他們具

¹⁷ 參閱〈塔裡塔外：雙重國籍的煩惱〉，《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26日，12版；〈大家談：談雙重國籍者任公職評議〉，《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27日，2版；〈塔裡塔外：請早作「痛苦」決定〉，《聯合報》（新北），1976年2月29日，12版。

¹⁸ 〈中國館長·國籍問題諸家駿查係兼任故於法尚無不合〉，《聯合報》（新北），1976年6月15日，2版。

有『雙重國籍』牴觸公務員任用法規，在65年（按：1976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國內各大報刊，一連發布了十多條新聞報導、讀者投書等，沒想到一紙投書，居然牽涉到『事實上，這個問題不只是發生在諸館長的身上，而是發生在很多公職人員，包括若干政府有關部門首長身上。』這事情如何了結？成了大家關心而頗為注意的事情」¹⁹

「牙刷主義」問題不但沒有因為諸家駿事件的落幕而結束，反而引發臺灣社會對於「牙刷主義」的更多關注，並且隨著中華民國外交處境的日趨惡化而升溫，在往後的臺灣媒體一再成為討論的焦點。

四、臺灣平面媒體對「牙刷主義」爭議的持續升溫

儘管諸家駿事件暫時平息，並不意味著「牙刷主義」問題從臺灣媒體的報導中消失，在臺美斷交之前的1977年，這股移民美國的風潮成為立委首次公開質詢的焦點引發媒體關注，在1977年3月5日立委莫萱元、楊登洲即對此提出質詢：

「指據來自海外的消息，我國有不少黨政軍高級幹部、民意代表、工商文化鉅子，在外國置產設籍，每年還到外國去報到點卯，或者把子弟送往國外，請政府查明，作為人事升降及忠貞考核的參考，並下令禁止黨政軍高級官員到外國置產設籍。」²⁰

¹⁹ 胡士丹，〈綠卡與人心〉，《新聞天地》，1621（1979.3），頁7。

²⁰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第1屆第59會期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66：19（臺北，1977），頁20。

立委楊登洲更進一步抨擊那些移民者具有崇洋心理，只知道將自己家人和財產想盡辦法轉移到國外，而政府在號召海外人才返國服務的同時，卻任由這些「有地位、有辦法」的特權份子逃往國外，這種現象是十分荒謬的：

「今天，我們不斷呼籲海外優秀人才回國服務，而少數的，有地位、有辦法的人卻往國外『開倒車』，這種逃避現實的鴛鴦作風，怎麼能使命在復興反共基地堅守工作崗位的忠貞同胞口服心服呢？」²¹

翌日，《聯合報》則發表社論對於立委莫荳元、楊登洲的提議加以評論，社論對於兩位立委抨擊的內容作了區隔，先區分出歸國服務的學人和留學生不屬於前述立委抨擊的「那些懷有崇洋心理的人士」，並且對有力人士將家屬、財產轉移至美國對於臺灣內部的影響表示憂慮，該報社論認為這些菁英份子位居要津，卻想盡辦法將財產與家人移往海外，這種行徑不僅使人懷疑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度，同時也嚴重打擊臺灣內部社會的團結：

「我們最擔心的，是原在公務或民意機關或工商界位居要津，卻悄悄的先在國外預留作寓公的後步。則其能否忠誠服務，即難使人無疑。而在此期間或又利用各種機會，將財產套流國外，更將影響國內經濟的發展與民心士氣。」²²

在《聯合報》的社論公開抨擊綠卡問題之後，《聯合報》的民

²¹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第1屆第59會期院會紀錄〉，頁48。

²² 〈從在外國置產設籍談起〉，《聯合報》（新北），1977年3月6日，2版。

意欄也出現許多直接批評政府官員、高級民代想盡辦法取得美國國籍的行徑的讀者投書。茲列舉數例：

「在外謀求落根或失職不回的駐外人員，暗自送家眷到國外置產，或備妥全家綠卡後在國內國外來去自如的人；以投資等名義，套匯等手段移產外國的人等等，都是很難隱匿的事實。」

「政府選用過多美國籍的官員，是否給老百姓一種『他們是否存有開溜念頭』的疑懼。」

「就在國家需要團結奮鬥之際，就偏偏有一批『牙刷主義』者存在，實在令人痛心疾首！為什麼政府不拿出魄力來消除這種現象呢？」

「我們的中央民意代表人數之多，任期之久，創下世界紀錄；但缺乏代謝，暮氣沉沉，且子女多半送往國外，所以內外掛心，影響議事運營。」²³

這些讀者投書的批評不僅是針對「牙刷主義者」，「萬年國會」的問題也成為被批評的對象，在這些讀者投書的字裡行間透露著許多民眾對國民黨政府官員與政府的不信任所產生的「信心危機」。

政府針對「牙刷主義」進行處置。從而醞釀出一股「千夫所指」的輿論情勢。1977年4月2日《聯合報》社論即直指：

²³ 參閱〈自信·自強·自救〉，《聯合報》（新北），1977年3月12日，2版；〈大家談〉，《聯合報》（新北），1977年8月15日，2版。

「因為苟有這樣一個政府高級官員，平日對部屬要求這，要求那，煞有介事的擺出『一品大員』狀，而背著人後，卻悄悄在外國買下房子股票，取得居留證，姑不問他的錢來自何處，他的居留證是否備而不用，單以他這樣腳踏兩頭船的虛偽面目，處心積慮，又何能平萬千公僕之心，消萬千公僕之氣。」²⁴

1977 年 5 月出版的《夏潮》的李明誠〈高官巨賈在美置產設籍的種種〉與同年 11 月吳士恭的〈閒言閒語〉兩篇文章除了批評持有綠卡的公務人員之外，也批評臺灣商人汲汲於轉移財產、申請綠卡的醜態與崇洋媚外的病態心理，並質疑政府當局修改國籍法的作法是鼓勵大家成為美國人。值得注意的是《夏潮》這幾篇文章在分析「牙刷主義」的原因時，均指出這些牙刷主義者是抱持過客心態「毫無在臺灣『往下紮根、往上結果』之意」。²⁵這種認為「牙刷主義」、「綠卡問題」的形成原因在於這些試圖移民美國者與臺灣這塊土地的疏離感，這種看法與先前諸家駿事件時《聯合報》讀者投書認為「應由自己的人民掌握國家的命脈」的「本國優先」頗有相似之處，但是展現出更多的鄉土性，顯示出當時鄉土文學思潮強調臺灣意識的主張對於黨外刊物的影響。

在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作出回應平息群情激憤的輿論。宣布要對於在外設籍置產的官員進行處理，例如要求重要幹部主動填報是否在國外置產或取得外國居留權，並可能根據這項資料再進一步調查，作為人事考核的重要參考²⁶。另外行政院

²⁴ 〈執政黨查究在外國置產設籍者〉，《聯合報》（新北），1977 年 4 月 2 日，2 版。

²⁵ 丁白，〈論牙刷主義〉，頁 23。

²⁶ 〈執政黨查究在外國置產設籍者〉，《聯合報》（新北），1977 年 3 月 31 日，

表示，政府官員如有違法在外國置產設籍之情事，一經查明，將依法嚴辦。甚至臺北市政府在內許多縣市政府也宣布要徹查內部公務員持有綠卡的消息。²⁷

對於國民黨政府要徹查國人及公務員在國外置產設籍的宣示，輿論抱持觀望的態度，例如《自立晚報》記者江春男的特稿〈什麼人在國外設籍置產？真能夠查出一個結果嗎？〉即高度質疑國民黨政府的決心，特稿中引述立委仲肇湘及多位不具名學者的看法，指出國民黨黨政要員在國外財產的情況或許較難掌握，但是取得綠卡的黨政要員有多少人，「如果政府或執政黨有決心調查的話，應該在短期內即可瞭解，而非交下一紙表格，要當事人自動申報。」該篇特稿結尾以以色列總理拉賓因美國存款曝光而引咎辭職的例子呼籲國民黨政府應該向以色列看齊。²⁸

相對於《自立晚報》對國民黨政府處理「牙刷主義」問題的懷疑與不信任，反觀同一時期的《中央日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則完全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追蹤報導或對國民黨當局的決心提出質疑。

不過，質疑官員移民美國的聲音仍未平息，反而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越演越烈。1977 年底的「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使黨外勢力不僅贏得五個縣市長、二十一席省議員、六席臺北市議員，使黨外勢力在省議會、縣市長選舉大有斬獲。更令國民黨政府震驚的是這次選舉期間爆發的「中壢事件」，使中壢警分局被抗議選舉不公的民眾包圍放火焚毀，造成二人喪生及十六部警車被

2 版。

²⁷ 〈政府宣布徹查在外國置產設籍者〉，《聯合報》（新北），1977 年 4 月 15 日，2 版。

²⁸ 〈什麼人在國外置產設籍？真能夠查出一個結果嗎！〉，《自立晚報》（臺北），1977 年 4 月 12 日，2 版。

毀，「徹底暴露國民黨統治威權的危機」。²⁹儘管有學者指出 1977 年黨外勢力在「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勝利並非完全是黨外勢力的訴求獲得選民認同的結果，而是國民黨試圖以提名黨中央指定的空降候選人取代地方派系色彩濃厚的人選引發地方派系的反彈，導致原本親國民黨的地方派系暗中支持黨外候選人和國民黨候選人對抗來讓國民黨難堪。³⁰無論如何，1977 年底的選舉結果象徵黨外勢力的崛起並且衝擊了原有的臺灣政治生態，尤其是黨外勢力在該年省議會的席次大幅增加使臺灣省議會的政治氣氛為之蓬勃，據資深媒體工作者王健壯所言：「省議會已成為臺灣政治中心」。成為臺灣多家主流大報政治記者採訪新聞的重心。³¹

依據評論家林濁水的看法，這次選舉結果不僅鼓舞民眾參與政治與關心國事的熱情，同時也讓黨外的省議員成為撻伐「牙刷主義」問題的主力。³²政府官員綠卡問題的質疑即延燒至省議會。翌年（1978）4 月屬於黨外勢力的省議員林義雄等人即針對政府官員在外設籍置產問題對省政府進行質詢，引發省議員林義雄、張賢東和省政府人事處長余學海之間的爭執：

「林義雄請教余處長昨晚是否想出如何禁止官員在國外『設籍置產』的辦法時，卻引發省議員與余處長之間的一場爭論。

余學海認為昨天只提到『綠卡』，並沒有人提到『置產』

²⁹ 彭懷恩，《臺灣政治變遷史》（新北：風雲論壇，2008），頁139。

³⁰ 任雪麗（Shelley Rigger）著，姚睿譯，《臺灣為什麼重要？美國兩岸研究權威寫給全美國人的臺灣觀察報告》（臺北：貓頭鷹，2013），頁117。

³¹ 何榮幸策劃、導論，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召集、採訪，《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臺北：時報，2008），頁400。

³²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美麗島》1：2（高雄，1979.9），頁15。

的問題，但林義雄與張賢東兩人則堅持昨天有人質詢這個問題，雙方僵持不下。」³³

從這段報導看來這只是一起普通的議會爭執，事實上對於代表省政府發言的人事處長余學海的回應過於輕描淡寫，據《自立晚報》的披露，余學海面對黨外省議員尖銳的質詢不斷迴避問題和閃爍其詞，甚至說出若持有綠卡的省政府公務員如果其「動機純正」則「值得照顧」等話語，即使質詢結束時省政府方面誓言要針對省政府內部的「牙刷主義」問題提出調查報告，最後仍不了了之。³⁴

由於國內輿論批判的聲浪不斷，甚至連國民黨內部都出現批評國民黨政府處理「牙刷主義」問題態度曖昧的聲音，例如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李鍾桂就表達對國民黨與行政院遲遲不願公布黨政人士雙重國籍和在外置產調查結果的不滿：

「過去我們曾對雙重國籍和在外置產情形加以調查，但調查結果卻未見公開向社會大眾交代。」³⁵

令人頗堪玩味的是在1978年5、6月間，相繼傳出省議會議長蔡鴻文子女均以取得美國國籍並赴美定居，以及擔任高中聯招試

³³ 〈對於在外設籍置產官員，省府決定加緊調查〉，《中國時報》（臺北），1978年4月20日，2版；〈省議會續質詢民政，議員同譴責身懷綠卡人〉，《中央日報》，1978年4月20日，6版。臺灣省議會秘書處，〈臺灣省議會第6屆第1次大會會議紀錄〉，《臺灣省議會公報》，39：10（臺中，1978），頁468-469。

³⁴ 〈綠卡〉，《自立晚報》（臺北），1978年7月11日，5版。臺灣省議會秘書處，〈臺灣省議會第6屆第1次大會會議紀錄〉，頁468-469。

³⁵ 〈李鍾桂主張行動政治 促國民黨大力革新 調查雙重國籍等事應公開交代〉，《聯合報》（新北），1978年2月15日，2版。

務委員會副主委的中山女高校長張叔南持有綠卡並不斷請假赴美的傳聞，但是《中央日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三份主流報紙處理這兩則新聞時卻採取輕描淡寫的態度，僅簡短報導張叔南滯美不歸的新聞，至於蔡鴻文家族定居美國的消息則隻字不提，甚至連《自立晚報》也是如此。³⁶在當時前述主流報紙的政治記者將臺灣省議會視為採訪的熱門地點的情況下都漏掉這條大新聞似乎是不可思議的。惟一的可能就是這些主流報紙都受到當局的壓力而保持緘默。³⁷

諷刺的是當主流平面媒體對這些具有「背景」的「牙刷主義」者保持沉默的同時，黨外雜誌《富堡之聲》披露這些權貴移民美國的消息引起社會譁然，該雜誌在 1978 年 5 月 10 日發行的《富堡之聲》第二十二期有四篇抨擊「牙刷主義」的文章。其中黨外人士黃順興在〈要走的不是我，是那些亡命者！！〉一文中除了抨擊「牙刷主義」者不顧一切移民美國的醜態之外，也諷刺國民黨政府粉飾太平的假相：

「自從退出聯合國和上海公報一接連的震撼以來，此地的『移民風』、『綠卡風』並未隨著政府當局的定心丸與夫所

³⁶ 經筆者查詢 1978 年 7 月的《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立晚報》，均未發現任何一則關於蔡鴻文家族定居美國被省議員質詢的新聞。至於張叔南持有綠卡一事僅有〈黑白集：卡之緣分〉，《聯合報》（新北），1978 年 6 月 18 日，3 版；〈綠卡〉，《自立晚報》（臺北），1978 年 7 月 11 日，5 版。

³⁷ 在戒嚴時期，許多敏感新聞因為警總施壓未見諸於主流平面媒體，例如 1970 年代擔任《臺灣時報》總編輯的俞國基當年處理一起軍機失事意外的新聞而遭到警總來電施壓：「這是地方的大新聞，晚上警總南部值星官撥電話問我：『這則新聞你們有嗎？』我說『有啊。』他說：『我只告訴你一句話，不能見報！』他說不能做，就不能做。第二天所有報紙都沒有這則新聞。那時，警總就是新聞的主宰。」何榮幸，《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頁 150。

謂經濟的繼續成長而平息，南京東路二段美國領館前還見大排長龍，每天因不斷擁擠的赴美簽證者，而途為之塞的現象依然如故，與所謂『社會安定』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³⁸

在黃順興看來，那些「牙刷主義」者幾乎都非善類，他對這些人是給予非常負面的描述：

「那些『整裝』待走者除了部分係留學生和探親者外，其餘殆半是已經在外國取得『綠卡』並且早已將此地所『撈』的不淨之財，非法套匯至國外之有財有勢的人。他們之所以先將子女、妻妾送走而還留老爺在此地的原因，係抱著多留一天多撈一些的貪而無厭的歪念而已。」³⁹

更主張將那些「牙刷主義」者立刻「請」出臺灣，以避免這些「寄生蟲」繼續危害臺灣：

「我認為讓這種不事生產，但知高級享受的寄生蟲多留一天，只有增加生產者和納稅人被剝削和社會風氣的污染，並影響此地的士氣，絲毫沒有好處可言。至於他（她）們套出去的既得利益嘛，就認了吧，也好讓他（她）們買副好棺材罷啦！！。」⁴⁰

³⁸ 黃順興，〈要走的不是我，是那些亡命者！！〉，《富堡之聲》，22（臺北，1978.5），頁12。

³⁹ 黃順興，〈要走的不是我，是那些亡命者！！〉，頁12。

⁴⁰ 黃順興，〈要走的不是我，是那些亡命者！！〉，頁12。

黃順興以自身為例說明自己和那些「牙刷主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自己將臺灣視為自己唯一的故鄉，在文章結尾，他再次強調自己絕不會像那些「牙刷主義」者那樣拋棄自己的家園。

「讓我再強調一遍，要走的，絕不是我而是那些亡命者呀！！」⁴¹

在此先簡略介紹黃順興曲折多舛的政治軌跡，出生於 1923 年的黃順興與李萬居、郭雨新等人早年從事黨外運動，在當時的臺灣黨外運動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其支持中國統一的政治立場使他成為臺灣意識強烈的黨外運動中的異數。儘管日後黃順興也在 1985 年前往美國探親為由順道轉往中國開啟另一段政治生涯，直到 2002 年於中國北京病逝。⁴²

矛盾的是，具有濃厚中國情結的黃順興在面對「牙刷主義」問題時展現出強烈的臺灣認同感，從他在文中一再疾言厲色地痛斥「牙刷主義」者是「亡命心態的傢伙」、「寄生蟲」，他以自己在農舍自力更生的生活跟那些「不事生產，但知高級享受的寄生蟲」作區隔來強調臺灣是他的家園，是他的根，但是熱愛鄉土的他最終也被迫在 1985 年藉由探親前往美國自我放逐。從黃順興的論述與日後人生軌跡中可以看出中國情結的「大認同」和臺灣意識的「小認同」在黃順興身上所展現出的複雜情感。

除了黃順興的文章之外，元老的〈跳船〉一文即依據《國籍法》施行條例第十條要求追究持有綠卡的公務員的法律責任並連

⁴¹ 黃順興，〈要走的不是我，是那些亡命者！！〉，頁 12。

⁴² 〈中共政壇台籍大老 歷經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治台、台灣黨外運動……黃順興心臟病突發逝世〉，《聯合報》（新北），2002 年 3 月 7 日，13 版。

帶追究其直屬長官的責任。更引人矚目的是該期另外兩篇文章，劉義的〈人間上品·大好山河〉、賴文華的〈建立廉恥的政治——蔡鴻文議長是否在國外置產？〉則直接披露臺灣省議會議長蔡鴻文子女在美國設籍置產加以責難並公布蔡鴻文之子勸其父儘速赴美定居的家書，這起事件始於1978年5月11日省議員蘇洪月嬌在質詢時揭露臺灣省議會議長蔡鴻文的二兒子、四女兒、二女婿已定居美國且擁有鉅額財富，蔡鴻文的家庭狀況除了有國家忠誠問題外，尚有逃漏稅與轉移財產至國外的疑慮。蘇洪月嬌更公布蔡鴻文的二兒子從美國寄回來的家信：

「我們離臺後，爸爸媽媽到臺北時，未能親自陪伴，甚感抱歉、遺憾；然而這世界已越來越小，我們能在這大好山河（按：指美國），佔上一席之地，也算擴大了咱們家來往之範圍，最大之希望，乃每年彼此都能相互來往，住上一段時間，則應是最好不過的事了。也許幾年後，咱們的下一代，會一個一個湧來此地（按：指美國），也說不定呢？」⁴³

蘇洪月嬌的質詢引發省議會譁然，而蔡鴻文當天即請假不再出席接下來的大會議程，也不對蘇洪月嬌的指控作任何的回應。⁴⁴

賴文華的〈建立廉恥的政治——蔡鴻文議長是否在國外置產？〉這篇文章也透露「全國各大報對蔡議長這件事根本就不重

⁴³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臺灣省議會第6屆第1次大會會議紀錄〉，《臺灣省議會公報》，39：10（臺中，1978），頁600。

⁴⁴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臺灣省議會第6屆第1次大會會議紀錄〉，《臺灣省議會公報》，39：10（南投，1978），頁601。

視，隻字未曾見報」暗指全國主要媒體受到政治壓力而噤聲。⁴⁵蔡鴻文子女在美國設籍置產的消息被《富堡之聲》披露後雖然仍未引起《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立晚報》等主要平面輿論的跟進報導，但是坊間對此議論紛紛，國民黨政府與當事人蔡鴻文對此則是諱莫如深。

已經鬧得沸沸揚揚的「牙刷主義」問題如何解決？國民黨喉舌的《中央日報》跟親國民黨主流平面媒體除了要求國民黨政府調查公務人員雙重國籍和在外置產的情況之外，並要求將查證屬實者撤職；或者是用道德勸說的方式勸相關人士放棄綠卡、將財產轉回國內以示「與國家共存亡之決心」。⁴⁶不過這些媒體也強調輿論只是針對擔任公職人員期間取得綠卡者，並非反對延攬海外學人返國服務。⁴⁷

面對外界輿論要求處理政府官員「牙刷主義」問題的壓力，國民黨政府再次表示對於政府官員在外設籍置產的反對或對相關牽涉人士施以壓力要求放棄綠卡，諸如「省府官員七人持有綠卡：四人表示願意放棄，另三人正報中央處理中」⁴⁸、「遴選海外地區立監委員，雙重國籍列入討論」。⁴⁹

⁴⁵ 賴文華，〈建立廉恥的政治——蔡鴻文議長是否在國外置產？〉，《富堡之聲》，22（臺北，1978.5），頁13。

⁴⁶ 〈社論：公務員不得具有雙重國籍的問題〉，《聯合報》（新北），1978年10月5日，2版。

⁴⁷ 〈社論：公務員不得具有雙重國籍的問題〉，《聯合報》（新北），1978年10月5日，2版。

⁴⁸ 〈省府官員十人持有綠卡，四人表示願意放棄〉，《中央日報》（臺北），1978年6月22日，3版。

⁴⁹ 〈遴選海外地區立監委員雙重國籍列入討論〉，《聯合報》（新北），1978年

儘管如此，國民黨政府對於「牙刷主義」問題的處理仍留有伏筆，行政院長孫運璿於1978年6月17日在立法院答覆質詢時表示：

「關於綠卡問題。需要說明一下：我國的國籍法不准許政府的公務員具有雙重國籍。可是美國的綠卡乃是一種長期的居留證，而有長期居留證的人，並不一定是美國公民的身分。所以從法的立場來說，僅僅具有美國的長期居留證，不具有美國國籍者，並不違反我國國籍法。」⁵⁰

孫運璿又補充雖然公務員取得綠卡並不違法，但是從國家立場，他反對公務員取得綠卡，不過，他還是強調不應該以「綠卡」影響延攬海外人才返國服務：

「當然一個公務員處心積慮的設法取得綠卡是不對的！不過如果我們需要國外的學者、專家、華僑回國服務，也不必以綠卡問題斷了這條路。」⁵¹

由孫運璿的答覆可以瞭解到國民黨政府在處理「牙刷主義」問題上仍持曖昧態度，儘管國民黨政府反對公務員取得綠卡，但是卻認為公務員取得綠卡並不違反國籍法而影響其公務員身分，同時又主張取得外國國籍的海外人士擔任公務員並無不可。但已

10月27日，2版。

⁵⁰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第1屆第61會期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67：48（臺北，1978），頁33。

⁵¹ 〈孫院長昨天表示不能為了綠卡問題妨害延攬海外人才〉，《聯合報》（新北），1978年6月18日，2版。原文詳見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第1屆第61會期院會紀錄〉，頁33。

經具有中華民國公務員身分又取得綠卡者，這樣的人有多少？層級多高？當局何時能提出完整的調查報告並說明處置辦法？這些臺灣各界輿論一再提出的質疑，國民黨政府仍然沒有就這些質疑提出具體回應。

儘管國民黨政府信誓旦旦地要處理「牙刷主義」問題，諷刺的是黨外雜誌《富堡之聲》直接指名道姓地報導國民黨權貴家族移民美國的消息，卻遭到同年5月20日遭停刊處分。⁵²黨外評論家林濁水認為《富堡之聲》的停刊就是因為揭發國民黨權貴家族移民美國讓國民黨當局感到難堪，才遭到國民黨當局報復予以停刊處分。⁵³

五、「綠卡攻防戰」：臺灣平面媒體對國民黨政府處理「牙刷主義」的不滿

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中止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這個劇變讓過去多年以來國民黨政府和臺灣社會最為恐懼的噩夢終於成真。美國，這個從1950年韓戰爆發以來一直是支持中華民國最為有力的盟邦再一次背棄了中華民國（上一次是1949年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臺美斷交這個外交上的打擊遠超過1972年退出聯合國，這幾乎意味著中華民國已成為國際上的孤兒，重創國民黨政府的國際合法性，同時也動搖臺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與臺灣前途的信心。

儘管國民黨政府一再呼籲「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口號以顯示全國團結一致的表象，但是並未有效平息社會大眾的不安與恐慌，高官巨賈紛紛移民的傳言在社會中不斷流傳，尋求移民美

⁵² 〈《富堡之聲》遭停刊處分〉，《聯合報》（新北），1978年5月31日，3版。

⁵³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頁16。

國的門路成為全國社會私底下熱烈談論的話題。⁵⁴與此同時，臺灣社會對「牙刷主義」問題的討論更為敏感，這種氛圍也影響到臺灣輿論對「牙刷主義」問題的報導。

在1978年12月與1月這段期間，《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立晚報》都未見到關於「牙刷主義」問題的報導，是否因為時局敏感的原因或當局的施壓使這些主流平面媒體不願報導這一類新聞？在缺乏相關史料的情況下，吾人僅能推測。

1978年12月16日臺美斷交後，親國民黨主流平面媒體上甚少出現「牙刷主義」的相關新聞，但是這樣的沉寂並未一直持續下去。1979年3、4月間爆發一連串經濟犯罪案件，這些犯罪案件的共通點是犯罪者均持有綠卡、在惡性吸金，掏空公司之後即捲款潛逃美國，尤其是前情報局長葉翔之之子葉依仁的捲款潛逃事件最引人矚目。⁵⁵對於這股風潮，親國民黨主流平面媒體也作了若干的討論，認為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在於「社會風氣敗壞、工商業者缺乏責任感、社會轉型造成原有社會規範逐漸失去約束力」。⁵⁶國民黨政府接下來一連串防範措施與聲明也和這些學者的看法相互呼應，都是僅定調為單純的「經濟犯罪事件」。⁵⁷對於學者們與國民黨政府刻意迴避這些經濟犯罪事件責任者的權貴背景與「綠卡因素」，黨外評論家有著不同的看法，後者認為正是這些持有綠卡的經濟犯罪者存有綠卡作為後路的僥倖心理，使他們「對鄉土都

⁵⁴ 〈社論：雙重國籍問題〉，《自立晚報》（臺北），1979年3月5日，1版。

⁵⁵ 〈「洋洋」倒掉，偷偷出國〉，《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4月20日，3版。

⁵⁶ 〈經濟犯罪與綠卡問題的一場辯論〉，《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5月16日，3版；〈也談所謂「綠卡」問題〉，《中國時報》（臺北），1979年6月9日，3版。

⁵⁷ 〈政府決擬有效辦法嚴防經濟犯罪〉，《中央日報》，1979年5月19日，3版；〈政府重申打擊經濟犯罪決心〉，《中央日報》，1979年6月15日，3版。

沒有歸屬感。如何會與鄉土上的事業共存亡？」⁵⁸

為了平息輿情，國民黨政府在 1979 年 3 月 5 日宣布除非是「原係僑居國外或留學期間取得外國居留證（綠卡）者」以外，持有綠卡的公務員申請出國時需「從嚴審核」，但是國民黨政府也為這些持有綠卡的公務員開了巧門，行政院認為持有綠卡者尚未取得美國國籍，因此無法適用國籍法限制其擔任公職。⁵⁹這種兩面態度顯然無法有效平息輿情，使得過不久國民黨政府又宣布較 3 月 5 日更為嚴厲的處置。同年 3 月 21 日下令公務員持有綠卡者一律不准出境，企圖扭轉臺灣社會對國民黨政府姑息「牙刷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

儘管國民黨政府表面態度上動作頻頻，仍然不能化解輿論的不滿，同年 3 月 10 日出刊的《新聞天地》作家胡士丹在〈綠卡與人心〉一文表達他的不以為然，質疑當局之所以用這些作法「是主管真的不明白這事情的底細，還是有意放這些『人』一馬？」⁶⁰

他針對行政院的作法逐條提出質疑，對於行政院第一項作法「持有外國居留證者，並未具有雙重國籍，故尚不受國籍法施行條例第十條之限制，暫不予限制」他認為：

「只是多了一個尾巴：何必『暫』不予限制？因為任用單位如覺得不合適就不任用；如已任用，錯在被任用者，政府憑什麼出爾反爾？」⁶¹

⁵⁸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頁 17。

⁵⁹ 〈公教持有綠卡問題政院研擬處理辦法〉，《聯合報》（新北），1979 年 3 月 6 日，3 版。

⁶⁰ 胡士丹，〈綠卡與人心〉，頁 7。

⁶¹ 胡士丹，〈綠卡與人心〉，頁 7。

至於第二項作法「原非僑居國外或非於留學期間取得外國居留證，而係於任職公教人員期間取得者，各機關對其申請出國案件，應從嚴審核。」胡士丹同樣也不以為然：

「某人既已是公務人員，如果想要長期國外居留則讓他去，但他必須真『去』，不可藉『探親』、『考察』、『開會』等名義去辦理長期居留『權』，辦好了，又賴在國內原先的工作崗位上不走。」⁶²

他建議國民黨政府如果真的要處理公務人員的「牙刷主義」問題，應該要四項辦法：

「（一）服有公職或民意代表等人，戶籍記載必須詳細，尤其是職業欄不可更改。其子女非經政府認定確有必要去外國讀書或就業外，必須全家在國內。

（二）服有公職或民意代表等人，不發給警察局證明書。

（三）核發護照時，請註明『出國事由』，如非『移民』（即永久居留），則註明『此護照不作簽發外國移民簽證』之用。並詳填『身分』或『職業』，『中華民國國大代表』，或『中華民國臺北市市長』。

（四）近三年來，幾乎每年都去美國一次的公務人員或頗具身分地位的人，請他交驗所有護照和簽證，查看簽證類別和他申請出國事由是否相符合。」⁶³

⁶² 胡士丹，〈綠卡與人心〉，頁7。

⁶³ 胡士丹，〈綠卡與人心〉，頁8。

胡士丹認為只有政府做到以上四點，才是真正的「從嚴審核」，「否則，何嚴之有？只是『具文』而已。」⁶⁴

胡士丹的建言其實是回應到輿論爭論「牙刷主義」問題的癥結，也就是針對特權份子與其親屬的出國狀況進行徹查，並仔細檢視這些人士的護照與簽證是否與其出國事由相符合。但是胡士丹的建言並未獲得輿論的共鳴以及國民黨政府的重視。

相反的，國民黨政府繼續用「延攬人才」、「爭取僑胞歸心」等藉口為自己不願認真處理「牙刷主義」者作辯解。臺灣省省主席林洋港於 1979 年 6 月 13 日在省議會表示：

「對於持有『綠卡』的人，必須視其動機審慎處理，絕不可一味認為持綠卡的人，都不可擔任公務人員。……我們如果一再堅持對綠卡偏頗看法，反而會中了共匪伎倆。」⁶⁵

林洋港的發言很明顯的暗示當局不希望外界繼續深入探究「牙刷主義」，避免「離間」政府與人民的感情而「中了共匪伎倆」。顯示出國民黨政府對政府內部「牙刷主義」風氣的偏袒和息事寧人的態度，甚至給外界批評的聲音扣上「中了共匪伎倆」的帽子。

甚至反而將抨擊「牙刷主義」的人視為應該鼓勵移民的對象，國民黨籍立委李志鵬在 1978 年 12 月提出質詢「凡是對臺灣無信心、對政府施政不滿的份子，應勸導其移民他國，有願過匪區奴役生活者，亦應毫不留情，送其前往匪區。」行政院則在 1979 年 3 月 5 日提出書面答覆，大意是：國人如願移民他國，政府決不留

⁶⁴ 胡士丹，〈綠卡與人心〉，頁 8。

⁶⁵ 〈林洋港昨答質詢指出，公務員持有綠卡，須視其動機處理〉，《中國時報》（臺北），1979 年 6 月 13 日，2 版。

難。⁶⁶

李志鵬立委的發言，乍看之下是批評那些「牙刷主義者」，但是在黨外評論家看來，李志鵬立委的發言事實上是給國民黨政府機會反駁外界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特別是針對那些批評政府施政，甚至是指責政府處理「牙刷主義」拖沓的黨外人士，「不（觸）及最嚴重的高官綠卡問題，反而巧妙的把『對臺灣無信心的』和與『對政府施政不滿的』混為一談。」⁶⁷

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態度連親國民黨雜誌的《新聞天地》都同感不滿，同年4月7日出刊的《新聞天地》雜誌社長卜少夫在〈嘴上吹牛，腳底抹油〉文章中呼籲國民黨政府儘快正視「牙刷主義」問題並嚴肅處理，否則輿論批判的矛頭會轉向國民黨政府：

「即使這問題在立法院、省議會、市議會、報紙上，很認真地鬧過一陣，但政府除對公務員出國有較嚴格的限制外，別無採取有效措施。」⁶⁸

「……會激發一股憤怒，認為政府不公道，無是非，姑息養奸，戕賊大家敵愾同仇的志氣。」⁶⁹

卜少夫已經預見到臺灣輿論情緒的變化，他的預測在往後臺灣平面媒體的態度中獲得實現。

黨外雜誌也觀察到這種趨勢，將批判的矛頭從針對當事者轉

⁶⁶ 〈國人如願移民他國政府絕不加以留難〉，《自立晚報》（臺北），1979年3月6日，1版。

⁶⁷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頁18。

⁶⁸ 卜少夫，〈嘴上吹牛，腳底抹油〉，《新聞天地》，1625（臺北，1979），頁4。

⁶⁹ 卜少夫，〈嘴上吹牛，腳底抹油〉，頁5。

移到國民黨政府，例如《美麗島》雜誌。

林濁水在 1979 年 9 月發表於《美麗島》雜誌的文章〈綠卡攻防戰〉，該文作者將「牙刷主義」爭議視為一場輿論攻防戰，作者指出那些持有綠卡的特權份子雖然處於守勢，卻能夠抵抗外界排山倒海的譴責聲浪：

「反對綠卡的無疑占大多數。因此在這場以寡擊眾的戰爭中，最少數的特權份子明白的顯示了他們抗拒民意之不可思議的巨大力量。」⁷⁰

作者不僅抨擊那些持有綠卡的公務人員和商人汲汲於申請綠卡以及將資金匯出國外，但是那些投機份子卻仍然留在臺灣利用自己的地位牟取利益或道貌岸然地擺出官員的架子「持卡人的問題不是能不能走，而是仍不肯走，仍需要『渡船』賺足最後一筆錢，以及掌理『渡船』上的行政業務甚至機密的問題」。⁷¹同時作者也抨擊國民黨政府在綠卡問題上的虛偽態度，例如：

「省市議會中所有黨外議員沒有不攻擊綠卡的，採取同樣行動的國民黨議員卻不足其總數的十分之一。而在答覆時，出來正面「照顧」持綠卡人士的都是黨員。」⁷²

相較於苦口婆心對國民黨政府提出諫言的主流報紙和《新聞天地》，黨外雜誌《美麗島》直接抨擊國民黨政府粉飾太平的態度以及面對「牙刷主義」問題的虛偽、拖沓。林濁水的〈綠卡攻防

⁷⁰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頁19。

⁷¹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頁18。

⁷²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頁19。

戰〉正是從這種視角批判國民黨政府處理「牙刷主義」的態度與暗批國民黨政府的「外來政權」性質。

1980年8月，中興大學傳出該校教授范衛生因為維護「綠卡」不致於失效而頻繁訪美，造成學生權益受到影響，遭到該校學生向監察院檢舉，再度引發臺灣各界對「牙刷主義」者的撻伐聲浪。⁷³

這起事件最後雖然是教育部認定「只要不影響教學職務，是否擁有綠卡，純屬私人問題。」而告一段落。⁷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平面媒體在這起事件的態度從過去對類似爭議的激烈批評反而流露出無可奈何的無力感以及對國民黨政府長期不願處理「牙刷主義」問題的不滿。這兩種態度可以從《中國時報》與《自立晚報》對范衛生事件的評論看出臺灣平面媒體對「牙刷主義」態度的轉變。

《中國時報》在同年8月21日的〈政界商界多少跨界人物，好說歹說還是不說也罷〉中詳述綠卡問題不只存在於教育界，舉凡政界、商界等都存在這個問題，最後引述不具名官員對「牙刷主義」問題的看法作為該文結尾「既然十多年都無法解決，因此『不談也罷』！」⁷⁵

至於《自立晚報》在同年8月26日的〈綠卡問題面面觀〉專題報導則直接批評「牙刷主義」問題已經是國內各界多年來猛烈抨擊的老問題，結果身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和政府的處理態度卻是令人失望，對執政黨與政府的調查「事隔多年卻不見下文」政府首長只知道一再重申「如查獲具體資料，將依法處理」卻毫無實

⁷³ 〈教授持綠卡中美兩地跑〉，《中國時報》（臺北），1980年8月19日，3版。

⁷⁴ 〈法律承認雙重國籍教授何妨持有綠卡〉，《中國時報》（臺北），1980年8月21日，3版。

⁷⁵ 〈法律承認雙重國籍教授何妨持有綠卡〉，《中國時報》（臺北），1980年8月21日，3版。

際作為。該報指責正是國民黨政府多年不作為的結果使「牙刷主義」的歪風從政商界蔓延到教育界。

上述媒體的報導中可以看出臺灣輿論在瞭解到國民黨政府無意認真處理「牙刷主義」問題，反而消極以對的無力感與憤懣。

面對輿論態度的轉變，國民黨政府索性在1980年11月10日透過行政院答覆立委質詢時表示：

「持有『綠卡』者，是否即可視為對國家『不忠誠』，此點似難一概而論……基於現實情況及需要，對於持有『綠卡』者之處理，尚宜從長計議。」⁷⁶

國民黨政府公開為「牙刷主義」定調，直接以「基於現實情況及需要」的藉口為「牙刷主義」進行解套。

國民黨政府於1980年11月10日的關於「牙刷主義」暫緩處理的宣佈無疑是和多數臺灣輿論的主張是背道而馳的，不過令人玩味的是這個宣布並未見諸於《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反而只有《自立晚報》報導這則新聞。

《自立晚報》在同年12月16日的特稿〈處理綠卡問題最為棘手，理由堂皇百姓卻難心服〉表達對國民黨政府在11月10日宣布對「牙刷主義」問題暫緩處理的不滿和失望：

「……行政院的這項答覆，可謂『冠冕堂皇，面面俱到』，不但以法規作『擋箭牌』；同時以『需人孔急』作為堂皇的理由，以掩飾綠卡存在的事實。不過行政院所築起的這

⁷⁶ 〈持有綠卡擔任公職既無外國國籍政府暫不限制〉，《自立晚報》（臺北），1980年11月10日，2版。

道擋水牆，很不幸的，仍無法讓一般民眾接受。」⁷⁷

《自立晚報》在這篇特稿中更針對行政院主張暫緩處理「牙刷主義」問題的論點逐條反駁，如行政院主張「持有『綠卡』，並不見得就對國家不忠誠」。《自立晚報》就表達不以為然的看法：

「『綠卡』無罪，懷『卡』其罪，因為它對我國的民心士氣有重大的影響。

就持有者而言，其本身的潛意識中恐亦難免會有逃避的傾向。雖曰持有綠卡是為了方便就學、就業、或經商，但不能諱言的，萬一出了事，也方便快跑離去，『洋洋事件』的葉依仁夫即為一例最明顯的例子。

行政院在函復立法院的質詢中，並且為持有綠卡者辯護說，持有『綠卡』，並不見得就對國家不忠誠。但是話說回來，為了表示對國家忠誠而放棄綠卡又有何不可？」⁷⁸

《自立晚報》認為行政院的作法只有助長政府內部的「牙刷主義」現象，不但打擊民心，同時也傷害公務員尊嚴和國家形象：

「目前我全國上下同胞正力圖振作，若任由於有綠卡者擔任公職，不但有辱公職人員之人格，同時亦有損我國莊嚴之國際地位的形象。」⁷⁹

⁷⁷ 〈處理綠問題最為棘手理由堂皇百姓卻難心服〉，《自立晚報》（臺北），1980年11月10日，2版。

⁷⁸ 同前註77。

⁷⁹ 同前註77。

在文章的結尾，《自立晚報》表達對國民黨政府長期以「延攬人才」、「國家建設」的藉口，遲遲不肯認真處理持有綠卡的公務員與特權份子的不滿，並且質疑由這種持有綠卡的官員領導國家如何能夠讓全國民眾產生信任感：

「一般民眾總以為，持有綠卡人士對國家之認同感有異常人，因而由此等人士擔任公務人員，又何能領導民眾？人才固然重要，但民心士氣亦不能侮。」⁸⁰

《自立晚報》的這篇特稿從民心士氣、國家形象為出發點，批評國民黨政府在11月10日的宣布暫緩處理「牙刷主義」問題，固然有「延攬人才」、「國家建設」等理由為如此決定辯解，但是對民心士氣的打擊和國家形象的損害使行政院的前述理由相形之下根本是得不償失。

可以視為臺灣平面媒體對於國民黨政府長年不願認真處理「牙刷主義」無奈而消沈的最終抗議。⁸¹

隨著進入1980年代後，臺美斷交帶給臺灣大眾的震撼逐漸消退，因此「牙刷主義」造成臺灣社會的焦慮感也不再如此急迫，逐漸不再成為主流平面媒體所關注的焦點。

六、結語

西方諺語有云：「在船沉沒之前，老鼠是第一個跳船的。」當1970年代的一連串外交危機打擊下，中華民國這艘船顯得前途未卜，許多人急著想離開這艘船；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些人在離開的

⁸⁰ 同前註77。

⁸¹ 同前註77。

同時，仍不忘利用自身的權力、地位為自己牟取利益，更奇特的是這些人竟然是中華民國這艘「渡船」的統治菁英。而1976年到1980年間的平面媒體和黨外雜誌如何呈現當局態度和當時報章雜誌的態度和社會氛圍？

表面看來，當時臺灣平面媒體對此一問題的基調，就是「持有綠卡的特權份子」，也就是「牙刷主義者」視為是不愛國的，享盡榮華富貴卻在危難時隨時會放棄這個國家的「叛徒」。正如學者羅吉·福勒（Roger Fowler）在論述媒體操作「我們」和「他們」二分法所觀察到的：

「為捍衛『我們』的正當性，就必須將『他們』圈在一起加以負面的烙印。在這裡『集團』（group）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的概念，『我們』往往與『民眾』等同、與『民意』等同，而在烙印『他們』上，則是透過某種歧視性的類目化（categorization）加以建構。而被歸類於他者的團體，就在一組修辭的操作下，被命名、被分類、被複製、甚至被刻板印象化。」⁸²

臺灣平面媒體對於這些「持有綠卡的特權份子」的刻板印象化敘述即符合福勒前述的觀點，這些持有綠卡的「牙刷主義」者是「不事生產，但知高級享受的寄生蟲」、「腳底抹油」的負面形象。這種對於持有綠卡的「牙刷主義」者單一固定化的刻板印象支配了往後臺灣平面媒體輿論的報導態度。

⁸² Roger Fowle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1991), p. 16. 轉引自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新北：韋伯文化，2003），頁108。

但是再進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立場的臺灣平面媒體對「牙刷主義」有著相當的分歧。

從本文所選定的主流平面媒體和黨外雜誌來看，平面媒體面對「牙刷主義」的態度是相當分歧的，相較於黨營媒體《中央日報》的淡化處理，親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時報》則是為「牙刷主義」緩頰，認為不能將海外學人、美國華僑和那些投機份子一概而論，而且甚少抨擊「牙刷主義」問題。同樣為親國民黨報紙的《聯合報》、《新聞天地》對於此一問題的態度最為積極；不斷對「牙刷主義」加以批評，認為國家處境艱困，不應該縱容這些高官巨賈「腳踏兩條船」的行徑。

《聯合報》、《新聞天地》這兩家親國民黨平面媒體為何敢於抨擊被國民黨政府諱莫如深的「牙刷主義」？或許是跟這兩家媒體經營者王惕吾和卜少夫的個人作風有關，王惕吾雖然被外界認為不若《中國時報》的余紀忠開明，但是在某些敏感問題上，王惕吾是比余紀忠更為堅持其主張。⁸³至於《新聞天地》的卜少夫，不僅是卜少夫旅居香港使他免於國民黨當局直接施壓，在新聞同業看來，卜少夫是「一個具有愛國憂時情操的人」，而且卜少夫敢於對國民黨政府某些作法表達強烈的異議。⁸⁴王惕吾、卜少夫二人的個人作風或許解釋了《聯合報》、《新聞天地》為何一直持續高調抨擊「牙刷主義」的原因。

雖然《聯合報》、《新聞天地》基於中華民國認同反對「牙刷主義」，但是它們的抨擊始終僅針對「牙刷主義者」或是苦口婆心

⁸³ 例如 1950 年代國民黨政府兩次推行《出版法》加強控制輿論，王惕吾每次都聯合臺灣民營報業抗爭，最終以〈新聞自律公約〉取代《出版法》，緩和當局對媒體的控制，參閱自葉邦宗，《報皇王惕吾》（新北：四方書城，2004），頁 189-216。

⁸⁴ 劉紹唐主編，《少夫這個人》（臺北：遠景，1980），頁 25。

勸諫國民黨政府拿出魄力處理「牙刷主義」問題，卻不願直接批評國民黨政府的不作為正是「牙刷主義」爭議未能解決的主要原因。

被視為自由派的《自立晚報》態度較《聯合報》更為激進，除了批評這些持有綠卡者對國家缺乏忠誠之外，也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國民黨政府的不作為。

另外黨外雜誌所呈現的「牙刷主義」，黨外雜誌對於「牙刷主義」多所抨擊，這些黨外雜誌不僅抨擊國民黨政府的推諉、拖延態度，更抨擊這些綠卡持有者只是將臺灣視為臨時的居所，毫無將臺灣視為家鄉之意：「在他們的觀念中，這一塊實實在在，可以度子度孫的土地，竟成為暫時棲身的工具——渡船——罷了！」⁸⁵這些對於綠卡持有者背棄自己家園的抨擊，顯示出受到當時鄉土文學注重鄉土認同的影響。同時也有暗喻國民黨政府的「外來政權」性質。

從臺灣主流平面媒體在1976年到1980年之間關於「牙刷主義」的報導中可以看出輿論對此一問題的變化。在1979年之前輿論批判的對象多集中在被懷疑持有綠卡的所謂「特權份子」，但是隨著國民黨政府在處理「牙刷主義」所表現出的敷衍、推諉，使輿論在1979年後對「牙刷主義」的義憤填膺逐漸轉變分化為無奈的消極態度以及把批評的矛頭指向國民黨政府，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林濁水在《美麗島》發表的〈綠卡攻防戰〉。

不過，在當時國民黨戒嚴體制下，這些輿論的批判聲浪仍然受到當局的箝制而有所節制，有時甚至被迫噤聲，例如1978年5月的臺灣省議會議長蔡鴻文家族集體移民美國的醜聞在坊間傳得沸沸揚揚，卻未曾見諸任何一家主流報紙的報導，而披露此事的

⁸⁵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頁12。

黨外雜誌《富堡之聲》卻在當月月底遭到停刊處分，顯示出國民黨黨國媒體控制對當時輿論的影響。

本文所選定的報章雜誌中所呈現的國民黨政府對於「牙刷主義」的處理態度是曖昧的。從諸家駿事件開始，國民黨政府就宣稱為了廣納海外學人返國服務或拉攏海外僑胞起見不應深究此一問題，教育部長蔣彥士甚至聲稱只要具有雙重國籍的官員具有「友好」國家國籍並無不可。面對外界於 1976 年以來每年都要求徹查政府官員具有雙重國籍者和資金外流情形的呼聲，國民黨政府雖然一再信誓旦旦地保證要調查相關情形，卻一直沒有下文，也不公布調查結果，「最後多數是會變成空打旱雷」。⁸⁶甚至反擊那些質疑政府處理態度消極的人「中了共匪伎倆」或將揭露高級民代家人持有綠卡的黨外雜誌停刊。實在令人不得不懷疑國民黨政府和這些持有綠卡的高官巨賈之間是否有不為人知的特殊關係？

至於這些輿論所反映的社會氛圍顯示出當時民眾對於「牙刷主義」的態度多持反對意見，不斷予以譴責或呼籲持有綠卡的高官巨賈「迷途知返」。反映出當時面臨外交危機時，輿論和民眾產生強烈的恐慌而產生的「獵巫心態」投射到這些綠卡持有者身上，將後者視為背棄國家的「叛徒」而加以責難。但是弔詭的是在同一時期，移民美國的風潮並未因此消退「美國領館前還見大排長龍，每天因不斷擁擠的赴美簽證者，而途為之塞的現象依然如故」、「移民美國座談會」廣受熱烈歡迎而不斷舉辦等種種現象來看，形成了兩極化的對比。⁸⁷

⁸⁶ 李明誠，〈高官巨賈在美置產設籍的種種〉，《夏潮》，2：5（臺北，1976.5），頁31。

⁸⁷ 參閱前註36，頁12；〈大家談：公然倡言移民美國此時此地是何居心〉，《聯合報》（新北），1977年8月26日，3版；〈大家談：有骨氣的中國人物在此時談移民〉，《聯合報》（新北），1977年8月27日，3版；〈大家談：前者

「牙刷主義」不僅反映當時臺灣社會對於外交危機的恐慌，同時也反映出當時國家認同問題和臺灣意識的興起。

儘管 1970 年代的「牙刷主義」問題在今日的臺灣已經成為歷史，但是從 2008 年總統大選中綠卡再度成為競選雙方辯論是否「愛臺灣」、在野黨質詢國民黨內閣的焦點，以及前立委李慶安在立委任內隱瞞具有美國國籍的新聞，直到 2014 年，總統馬英九本人是否仍然持有綠卡成為臺灣媒體輿論所關注的焦點來看，「牙刷主義」的幽靈所引發的認同危機仍然在今日的臺灣社會中徘徊不去。⁸⁸

堅定不「移」懦夫隨風而逝！》，《聯合報》（新北），1977 年 8 月 29 日，3 版。

⁸⁸ 參閱〈非我族類，拿卡是罪？〉，《聯合晚報》（新北），2008 年 1 月 31 日，A2 版；〈謝：我認為馬夫婦綠卡仍有效〉，《中國時報》（臺北），2008 年 2 月 1 日，A4 版；〈社論：馬政府如何走出綠卡泥淖〉，《聯合晚報》（新北），2008 年 6 月 8 日，A2 版；〈社論：馬政府如何走出綠卡泥淖〉，《聯合晚報》，2008 年 6 月 8 日，A2 版；〈雙重國籍任公職，涉詐領上億薪資李慶安被起訴〉，《中國時報》（臺北），2009 年 9 月 17 日，A1 版。〈馬遭美追稅風波，綠委籲清查綠卡公務員〉，《自由時報》（臺北），2014 年 5 月 14 日，A3 版。

徵引書目

一、史料

（一）報紙

《聯合報》，新北。

《聯合晚報》，新北。

《中國時報》，臺北。

《中央日報》，臺北。

《自立晚報》，臺北。

《自由時報》，臺北。

（二）官方出版品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第1屆第59會期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66：19，臺北，1977，頁20-48。

立法院公報處，〈立法院第1屆第61會期院會紀錄〉，《立法院公報》，67：48，臺北，1978，頁33。

臺灣省議會秘書處，〈臺灣省議會第6屆第1次大會會議紀錄〉，《臺灣省議會公報》，39：10，臺中，1978，頁468-601。

二、專書著作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戰後台灣媒體與轉型正義論文集》，臺北：吳三連獎基金會，2008。

呂東熹，《政媒角力下的臺灣報業》，臺北：玉山，2010。

彭懷恩，《臺灣政治變遷史》，新北：風雲論壇，2008。

任雪（Shelley Rigger）著，姚睿譯，《臺灣為什麼重要？美國兩岸

研究權威寫給全美國人的臺灣觀察報告》，臺北：貓頭鷹，2013。

何榮幸策劃、導論，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召集、採訪，《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臺北：時報，2008。

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臺灣報紙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新北：韋伯文化，2003。

葉邦宗，《報皇王惕吾》，新北：四方書城，2004。

劉紹唐主編，《卜少夫這個人》，臺北：遠景，1980。

Fowler, Roge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16-18.

三、期刊論文

丁白，〈論牙刷主義〉，《夏潮》，1：9，臺北，1976.1，頁 23。

李明誠，〈高官巨賈在美置產設籍的種種〉，《夏潮》，2：5，臺北，1976.5，頁 28-31。

路愈之，〈牙刷主義〉，《夏潮》，1：5，臺北，1976.8，頁 42。

胡士丹，〈綠卡與人心〉，《新聞天地》，1621，臺北，1979.3，頁 7-8。

卜少夫，〈嘴上吹牛腳底抹油〉，《新聞天地》，1625，臺北，1979，頁 4-5。

林濁水，〈綠卡攻防戰〉，《美麗島》，1：2，高雄，1979.9，頁12-18。

黃順興，〈要走的不是我，是那些亡命者！！〉，《富堡之聲》，22，臺北，1978.5，頁 11-12。

Controversial Issue Regarding Green Card Seen in Taiwan's Printed Media (1976-1980)

Liu, Li-de*

Abstract

When ROC in years of crisis in 1970s, Many of Taiwanese people face the future with a profound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foreboding, many people including KMT government officers tried to immigrate to the U.S. Many privileged classes to obtain a green card are an open secret that this was criticized by public opinion through the pipeline. These acts are not only privileged people outside ridiculed as “toothbrush doctrine” by outside; Tang-Wai movement also criticized the KMT government's excuse. Become the social problems emigrated to the U.S. derive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impact of the 1976-1980 Taiwan printed media at the time how to reported by emigration and these stories showing how the collective mentality of the time and the gradual rise of Taiwanese society through Tang-Wai magazines for the KMT government criticism the various views oriented.

Keywords: Green card, Dual citizenship, Printed media,
Local awareness

* Master of Art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